

文苑笔谈

春日好时光 踏青放歌行

赵柒斤

若非闰二月,传统的“上巳节”转眼将至,可“农历三月三”在江淮、江南一带又称之为“鬼节”,正所谓“三月三、九月九,没事别在河边走”。这些民俗却与史籍记载的上巳节大相径庭。

753年(天宝十二年)上巳节时,诗圣杜甫唱出“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的金句,这两句是《丽人行》首句。该诗用细腻的笔法、富丽的辞采,描写出一群体态婀娜、姿色优美的丽人。整首诗虽不见讥讽之语,却在惟妙惟肖的描摹中,对杨国忠兄妹骄奢淫逸的生活进行了讽喻。此诗的本意虽非歌颂,却也无意地给后人留下唐代“上巳日”仍延续清流濯垢、踏青狂欢、男女相会等古代习俗。

上巳,指的是干支纪日法中三月的第一个巳日,又称元巳、初巳。何为“巳”?东汉著名学者应劭《风俗通义》注释:“巳者,社也。邪疾已去,斩新社也。”由此可见,“巳”有“福祉”“祛除”两层含义,乃延续并升华远古的习俗。谁来“巳”?《周礼·春官》曰:“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周代称“水滨祓禊”。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注释:“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衅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应劭《风俗通·祀典》注释“禊者”为“洁也”。故而,史学家、民俗学家们认为,上巳节最原始的意义,是上古先民春季驱邪祛瘟的卫生保健活动。

不过,暮春时节,阳气布畅,万物复苏,适合青年男女约会,况且“巳”本身包含“求子之祭”意思。《周礼·地官司徒·媒氏》说得更为到位:“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因而,古代“上巳节”又是浪漫的女儿节、情人节。《诗经·郑风》最后一首《溱洧》曰:“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简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画面中,溱水清水向东流,三月冰融水上涨。男男女女春游,一对男女在一汪春水旁隐晦地吐露着爱慕的心思。姑娘说:“去看看吧?”小伙子显然是愣头青,竟愣愣地回答:“已看过了。”姑娘又说:“不妨再去瞧瞧,那溱水河边地广人多,欢乐也多。”诚然,那边欢声一片,男女临别时还互赠芍药。

到汉代,朝野上下都非常重视上巳日。《后汉书·礼仪志》述:“是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病,为大洁。”“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礼,乘舆具,具威仪。教、导及诸名胜皆骑从。”东汉人上巳日除了洗濯,还要大摆筵席,招待宾客。东汉学者、西人杜笃《襜褕赋》谓:“旨酒佳肴,方丈盈前”,河岸摆放的美酒佳肴,足有一丈见方。这显然不只是为祓禊仪式准备的祭品,极可能是邀请朋友一起到河边相会,共享美好时光。流水之滨宴饗宾客,也反映了上巳节传承至东汉,已呈娱乐化发展趋势。

上巳节传承至魏晋,不仅时间固定于农历三月三日,其节日内容还得以进一步拓展。魏晋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混乱时期。立于危世,命如朝露,士大夫明哲保身,逃避现实,或晤言于一室之内,或放浪形骸之外。就连过上巳节,心态也与普通人大大不同,既以当局者身份介入其中,也借助文字,以旁观者的姿态记述风俗民情。尤其是魏晋名士的加入,加速了上巳风俗的流传。最经典的例子,无疑是书圣王羲之的“曲水流觞”。

按《兰亭集序》所示,曲水流觞的兰亭,周遭是“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对平素就嗜歌行吟于山际水畔的魏晋名士而言,无疑是最佳聚会场所。魏晋名士聚会,自然少不了酒和诗,先将水从高处引来,环曲成渠,是为“曲水”;再将盛酒的酒杯“觞”浮于水面,使之从上游顺流而下,借助水流之力传杯递盏,即是“流觞”。与会者列坐于河渠两岸,待觞飘至身边,在谁面前打转或停下,谁就取过一饮而尽,然后按事先讲好的规矩,或吟诗,或咏唱,或起舞。这种宴席上,酒是感情的催化剂,诗是情感的衍生物,饮酒作诗要有规矩,“曲水流觞”便是文人的规矩。

南宋文人吴自牧史料笔记《梦粱录》卷三“三月”谓:“三月上巳之辰,曲水流觞故事,起于晋时。唐朝赐宴曲水,倾都倾野,亦是此意。”故而,魏晋风度和曲水流觞,成了被后世数代文人墨客反复歌咏的主题及精神向往高地。

唐代上巳节,朝廷准许文武百官放假游玩,甚至出钱在曲江一带公款赐宴。晚唐池州文人康骞笔记小说《剧谈录》卷下“曲江”条云:“上巳即赐宴臣僚,京兆府大陈筵席,长安、万年两县以雄盛相较,锦绣珍玩无所不施。百辟会于山亭,恩赐大常及教坊声乐。池中备彩舟数只。唯宰相、三使、北省官与翰林学士登焉。每岁倾动皇州,以为盛观。”白居易也用“赐宴仍许醉……曲江春意多”诗记录下来。不过,诸多唐诗也反映了“踏青”已融入上巳节活动。唐殷尧藩吟“三月初三日,千家与万家……鞍马皆争丽,笙歌尽斗春……骑罗人走马,遗落凤凰钗”,张祜唱“猩猩血影系头标,天上齐声举画桡”,崔颢咏“已日帝城春,倾都祓禊展……弱柳随车骑,浮桥拥看人”。唐代上巳节踏青春游的诗篇不胜举,为宋代实现上巳与寒食清明合二为一夯实了基础。宋代大文豪苏轼的“老鸦衔肉纸飞灰”“木棉花落刺桐开”和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百五重三并一期,风光不怕不妖娆”,都直接表明,上巳已与寒食清明合二为一。

到经济繁荣的宋代,上巳节终被寒食清明“兼并”,然上巳节流传下来的传说故事、诗词歌赋等都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产品;历代以来不断丰富、亲近自然、踏青春游、交朋结友等节目,也充分展现了国人很早就开始的对生活情趣和生命质量的追求,彰显了民俗文化的巨大魅力。



清·陈枚《月曼清游图》(局部)

阅评

文人不仅能写冰雪般的文章,也能定治国安邦之策,经世济民之略,所谓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中国古人关于法治和德政的思想更是囊锥露颖,是中国古代留给世界的宝贵文化遗产。

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贾谊,虽然被苏轼评为“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然而其人格刚健真诚,情辞恳切刚直,尤其是其《治安策》立意高远,见解独到,气势磅礴,贯穿其中的法治思想更是振聋发聩、直击要害。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贾谊与晁错》中认为:“惟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毛泽东亦认为《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时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1. 贾谊《治安策》“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开篇即批评那种以为天下太平、平安无事者,犹如“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不是愚昧无知,就是阿谀奉承。《治安策》引用《管子》“礼义廉耻,谓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之谓,主张施行法治:“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以承祖庙,以奉六亲,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经陈纪,轻重同得,后可以为万世法程”。他将“经制不定”的危害比喻为:“犹渡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舡必覆矣。”

贾谊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古代屠牛坦这个人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钝,所排击剥割,都是顺着肉的肌理下刀。碰到胯骨、大腿骨之处,非斤则斧——不是用刀刀而是用斧头砍。“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诸侯王皆众觝脚也,释斤斧之用,而欲罢以芒刃,臣以为不戢则折。”主张雷厉风行,快刀利斧,不可优柔寡断,贻误时机。

《治安策》对法治的重要性、必要性说理透彻、生动形象,同时也贯彻了儒家的德政思想。作者认为,夏471年、商500年、周800年,三王之所以能长期维持统治,其原因在于它们创设了教育、辅导太子的制度。太子少时设置少保、少傅、少师,保其身体、传之德义、训练智慧,使之明孝仁礼义,驱除邪恶,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并举反例指出:秦始皇派赵高做胡亥的老师,胡亥所学的,不是斩首级、割鼻子,就是灭三族。《治安策》引用孔子所言“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的听讼最高境界,认为“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作者主张“道之以德政者,德教洽而民气乐”,而仅仅“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贾谊在其名篇《过秦论》中也指出秦亡在于“仁

影评

烟火与星光交叠,无比绚烂,构成了短暂生命的绝佳隐喻。或许,缅怀的方式之一,就是把思念落在一个具体的细节上,记住他的名字,他的声音,在没有边界的时空中,在浩渺的宇宙中,赋予他一个坐标。

我们的一生有很多大事,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升职加薪,这些都是关于喜悦,但有一件大事,是我们国产电影很少触及的,那就是与生命挥手告别。《人生大事》这部电影是2022年刻画国人情感的国产电影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包含了亲情、友情、爱情,以及在面对现实生时的各种选择,也更让很多人明白了一个道理:此生除了已死,都是小事。

我们从小受到的死亡教育是避讳到相关的词汇,但其实它不是晦气,那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完成一次生命的旅程。《人生大事》正是以一种深情而不煽情、浪漫而不做作的表达,提供了一种共情的力量,实现了一种电影叙事美学的平衡。影片既让观众感受到死亡与别离,颓丧与混乱,又着重表达了人性的闪光和温暖。导演选择用这种温暖的方式,以喜剧讲述生与死,展现一群殡葬从业者的日常。他们面对死亡充满敬畏,怀着一颗圣人之心从事这个行业。他们送亡者体面地离开,给生者以慰藉,把殡葬行业全面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让大家都清楚地了解这群“种星星的人”。

几年前,新闻里曾广泛报道一些刑满释放人员从事殡葬服务业。众所周知的原因,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是个难题,虽说刑满释放人员依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

文学家笔下的治安策

孙全喜



明·汉古阁刊本《春秋左传注疏》

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是这种德礼仁义思想一以贯之的体现。

《治安策》的忧患意识和法治思想影响深远。宋代章甫《送张寺丞》诗云:“公必念尔民,还陈治安策。”明代海瑞亦作《治安疏》,被认为和贾谊的《治安策》一样,都是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之作。海瑞指出,今日职守之废、职守之苟且因循,不认真、不尽责而自以为是者俯拾皆是,主张“敦本行以端士习,止上纳以清仕途……”府州县地方官要生计和教化并重,树立好的礼俗规范;让那些贪赃枉法的人心生怯懦,按照刑律处罚他们,毫不手宽。

2. 《治安策》具有深厚的德政渊源,除了孔孟荀主导的礼法结合、德主刑辅思想传统外,《左传》《国语》《史记》等文学篇章也凝结了丰富的德政思想。《左传·郑伯克段于鄢》入选《古文观止》首篇,虽然郑伯认为弟弟共叔段“多行不义必自毙”,“自作自受”,但史书对郑伯不约束、管教其弟,放任自绝,处心积虑杀伐之举依然颇有微词,但对郑庄公以隧道母子相见,避开黄泉相见之誓,却盛赞为“其乐融融”“其乐泄泄”。可见重视孝道人伦的道德观由来已久。

《左传·子产论政宽猛》中子产曰:“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者。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伤,故宽难。”赞赏孔子说的:“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

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主张不事不躁,不刚猛不柔弱,政策平和,所有的福祉就会汇集过来。《国语·叔向贺贫》记载,晋平公的正卿韩宣子为贫穷而发愁,晋国大夫叔向却向他表示祝贺:“从前栾武子没有一百顷田,家里穷得连祭祀的器具都不齐全;可是他能够传播德行,遵循礼制,名闻于诸侯,各诸侯国都归附他。如果不忧愁德行的建立,却只以为财产不足而发愁,我表示哀怜还来不及,哪里还能够祝贺呢?”

《史记》中无论是择善饿死的叔齐伯夷列传,还是忧国忧民的屈原列传,抑或为李陵之死而大呼不平,司马迁始终秉承公正史观,坚持道德操守至上,“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尤为闪耀历史星河的,是一代文豪韩愈、欧阳修、白居易、苏轼,高歌“大江东去”,吟叹“长恨歌”,悲枪“雪拥蓝关马不前”之余,对刑的原则、德的教化、礼的规引殚精竭虑的论述,筚路蓝缕的追求,丰富和发展了德政及法治思想。

韩愈以“儒家道统”继承者自居,因袭儒家礼法兼用、德礼为先的主张,认为孔子的“道之以政,齐之以礼,则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不如“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也”。他在《原道》中指出“仁义道德”就是道之根本,在《原毁》中指出“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并得出“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处世

歧途者的新生

才东

但实际情况是,就业是很多刑满释放人员很难跨越的坎。相对冷门的殡葬行业成了一些刑满释放人员的选择。影片中莫三妹的人物设定就是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同时也是一个殡葬从业者。

电影是以小文——这个和外婆相依为命的孩子如何接受外婆离世这件事展开的,通过一个孩子的视角展开故事,认识死亡。在她眼中,死亡完成了从装到大盒子被烧成烟雾,到烟雾变成了天上美丽的星星的圆满过程。电影用一个孩子的视角来看待这件讳莫如深的大事,死亡好像变得轻柔、温暖了起来,正如剧本作者所说:当所有人聚集在葬礼上缅怀逝者,回顾他的一生,讲述自己和他的感情,为他人殓穿衣、守灵吊唁、烧纸出殡……原来葬礼上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在治愈活着的人;在看似烦琐的仪式背后,竟不一般的浪漫深情。

莫三妹及其伙伴、父亲、街坊,以及中间出现的去世小女孩的父母,都是小文关于这堂生命教育课的老师;其实也是在给很多忌讳这个话题,又不知道该如何向孩子解释的成年人一次重新思考的机会:我们在怕什么?又为什么要怕?就像影片中老爷子说的那段话一样:“人生啊,就像一本书,哪一本都要翻到最后,有的,有的画的是句号,有的画的是省略号。”除了这两种答案,还

有另一个结果,有太多人最后画上的都是一个问号。句号代表了无牵挂;省略号代表未完待续、意犹未尽;问号是最残忍的,因为还有很多问题困惑不解。

影片用意象写实的手法,融入了相对抽象感性的人生思考,观众尽可自由选择对号入座或不入座,“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无论何种境界,观照自身,总能有所感悟、有所收获。这就是这部电影留给观众的一个命题,看完每个人心中自有一个答案。

影片中,除了小文外婆的葬礼,后四场葬礼,四种不同,使情节的发展层层递进。第一场小场的葬礼,那是一段短暂的人生,那是一场遗憾与悲恸,是莫三妹第一次在殡仪这件事中的一些感受。第二场“活人葬礼”,老人看着众人,于是莫三妹不得已求助父亲。在父亲的指导下,他以双手拼合遗体的筋脉骨骼、血肉肌理,努力复原逝者在亲人心中的记忆。当死者的面孔栩栩如生般重新出现

修德之难的结论。

欧阳修在《纵囚论》中记载了唐初囚徒囚三百余人这种行为为不可取,因为对这些死囚而言,“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的虚假期望,这是沽名钓誉、正正确的做法是以国家的常法治理国家,必定以合乎人情为标准,不以标新立异为高明,不能违背情理来博取自己的名誉。他强调的合理性和稳定性。

白居易曾任刑部尚书,在《刑礼道》中继承了儒学“德主刑辅”的思想,从而把“法”上升到与“德”相同的地位。他说:“夫刑者可以禁人之恶,不能防人之情;礼者可以防人之情,不能率人之性;道者可以率人之性,不能禁人之恶。循环表里,迭相为用。”“衰乱之代,则弛礼而张刑;平定之时,则省刑而弘礼;清静之日,则杀礼而任道。”进而提出“愚法为上科”“升法直为清列”的思想。

苏轼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中主张慎刑思想:“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赏如有疑照给,为的是推广恩泽;罚如有疑则应去除,为的是谨慎地使用刑法。这样符合《尚书》主张的“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原则。他进一步阐述,当“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同时辩证指出具体赏罚的局限性:即使奖赏,不能仅仅奖赏爵禄;即使刑罚,不

能仅仅刑之于刀锯。因为用爵禄行赏,只能对得到爵禄的人起作用;用刀锯作为刑具,只对受这种刑的人起作用,对没得到爵禄和没有受到这种刑的人不起作用。天下的善行是赏不完的,不能都用爵禄来奖赏;天下的罪恶是罚不完的,不能都用刀锯来制裁。那该怎么办呢?苏轼认为应该“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在奖赏善者之余,又用歌曲赞美他,并勉励他坚持到底;在处罚不善者之余,又要哀怜同情他,希望他抛弃错误而开始新生。这就是“忠厚之至也”。这一思想和主张,我们今天依然在发扬光大。

西汉廷尉路温舒虽不是文人骚客,但是他写的《尚德缓刑书》奏章,提出了放宽刑罚、崇尚德政、改变重用治狱官吏的政策,得到朝廷的欣赏和采纳。《尚德缓刑书》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是法密政苛,重用狱吏。汉承秦法这一弊政,必须改革。他还反对刑讯逼供,认为刑讯迫使罪犯编造假供,给狱吏枉法定罪开了方便之门。路温舒“尚德缓刑”的主张受到重视,汉宣帝曾下诏在廷尉下面设置廷平四员,秩六百石,负责审理冤狱。

3. 无论是《左传》《国语》文学名篇中的道德渊源,还是贾谊的“定经制”,韩愈的“德礼为先,辅以政刑”,白居易的“刑礼道迭相为用”,欧阳修的法的合理性,苏轼的慎刑思想,都坚持了缘法而治、天下无讼的精神,主张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原则,执着司法公平正义的理想。而在具体司法方案中,汉代大儒董仲舒又提出“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原则。在其著作《春秋繁露》中说:“《春秋》之所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善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论其轻”。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也认为,春秋有原心之法,有诛心之法。“原心定罪”即“动机论”,是指根据心理动机来确定有无罪过或罪过轻重,仍旧坚持道德至上立场,重视犯罪人主观心态和主观改造。

文人提笔定乾坤,将文学和法律融为一体,发天地之问,究人性探索,建法治之基,文笔峻峭,论述深刻,充满匡扶正义的豪迈和济世安邦的激情,读之如饮醇醪,不觉自醉。而这一切得益于政治的相对清明和开放,君主的兼听开明,“川泽纳污,山藪藏疾,瑾瑜匿恶,国君含垢”,文化和经济社会的鼎盛发展。然能文能武,天妒英才;高霞孤映,凤摧秀林。贾谊三十二岁,带着满腔热血、一腔热血,在《吊屈原赋》中抑郁而亡。后人叹曰:“遭逢圣主落江湖,年少多才岂不祥。自古孤根难独任,堪嗟同姓楚兰芳。”

历史有阴影,也必定有光,法律笃定与正义为伍。《左传》:“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一直是中国传统法治思想的中轴线。

个历经坎坷的人都可以这样走向美好……

当所有人聚集在葬礼上缅怀逝者,回顾他的一生,讲述自己和他的感情,为他人殓穿衣、守灵吊唁、烧纸出殡……原来葬礼上做的一切,都在让人理解生命的意义。

影片从片头到片尾贯穿始终串联起所有故事、反复以不同形式出现的是李叔同先生创作于1915年的《送别》。老电影《城南旧事》的主题歌也正是这首《送别》。《城南旧事》中的《送别》,清冷苍凉,充满了人世无常的悲凉和离别的惆怅,而《人生大事》中的《送别》,却变换了原曲的沧桑基调,变得温暖柔和了起来。

对于死亡很多人都会想起一句经典的电影台词“死亡并不可怕,遗忘才是最终的告别”。但我们中国人也有我们自己的表达,那就是起誓挥手告别,我们更愿意永世不忘、与你隔空相望。那些爱你的人并没有离去,他们只是去了远方。所以最后电影结束打出了那行字,就是影片的终极解释,“天上的每一颗星,都是爱过我们的人”。我们不会忘记,因为抬头见天,繁星点点,就算某天有乌云或是月亮太耀眼,但总有某一天,你会看到远方有星星对你眨眼,那个爱你的人在看着你、牵挂着你,未曾,也永不离开。

而当电影把生与死的理解投射到莫三妹这样一个特别身份的人物身上时,才能让他完成对曾经的有形之罪和无形之罪的超越,对贪念、嫉妒、仇恨的消弭。

人生大事,生死二字,生当尽欢,死亦无憾。

最后,仅以此文,献给所有天上的星星和牵挂着星星的人们。但愿,今夜有星。但愿,星星会闪。